

创伤与救赎

——兼论《架着双拐的人》中的战争责任之思

孙延永

(内蒙古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00)

摘要:《架着双拐的人》是远藤周作创作的一部以战争创伤与救赎为主题的战争反思小说。学界对《架着双拐的人》的评论主要聚焦于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领导层及国家的批判,却鲜少有人关注隐藏在创伤与救赎背后的关于个人战争责任的思索。作品把主人公当作日本战后时代的一个缩影,通过探寻复员兵加藤战争创伤的异化原因以及其无法获得救赎的结局,影射出战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伦理困境。在战后日本民众普遍将战争责任归咎于军国主义、淡化自身责任的情况下,该作品对普通士兵乃至普通民众在战争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反思。《架着双拐的人》不仅拓宽了“远藤文学”对战争责任追究的视野,还突破了战后日本作家仅将日本民众视为受害者的传统书写模式,展现出更为深刻的战争反思意识。

关键词: 创伤; 救赎; 身份认同; 个人责任; 战争责任

中图分类号: I313.07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6)01-00107-10

0 引言

战后,在探讨日本的战争责任时,日本作家普遍将责任归咎于日本军事领导层的错误决策,而将普通民众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创作的战争小说往往侧重于描述日本民众所经历的战争创伤,却鲜少有人提及个人在战争中的责任,更不用说深入追究这些责任了。在为数不多的日本人战后创作的战争小说中,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可谓独树一帜。在这部小说中,远藤周作塑造了饱受战争创伤的加藤昌吉这一角色,通过深入探究加藤昌吉无法摆脱战争创伤的根源,引发了对个人战争责任的深刻反思,促使日本民众审视自身的战争责任。《架着双拐的人》于1958年发表在《文学界》杂志上,小说描绘了侵华战争士兵加藤昌吉因在战争中残忍杀害中国平民,导致战后出现精神创伤,表现为双腿麻痹,无法正常行走,成为一个依靠双拐生活的人。尽管神经科医生菅通过一系列精神疗法找到了病

收稿日期:2025-10-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近代日本文化人的‘蒙疆’书写研究”(19YJA752019)、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战后冲绳文学战争创伤研究”(SKBS0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延永,男,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和冲绳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孙延永. 创伤与救赎——兼论《架着双拐的人》中的战争责任之思[J]. 外国语文,2026(1):107-116.

因,但最终仍未能治愈加藤昌吉。故事的情节看似简单,却融入了战争创伤、战争救赎、疾病叙事等丰富元素,成功塑造了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战争创伤群体意象。

目前,国内外关于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的研究相对有限,且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个人战争创伤的探讨,认为作品深刻反映了战争对人类造成的双重创伤,并揭示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本质(赵雪莲,2008:171)。此外,部分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出发,审视作家的战争反省意识,指出远藤周作对战争的侵略本质及责任有着冷静而客观的认识。在描写本国国民身心创伤的同时,他清晰地意识到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损失与苦难,展现出以受害国为对象的明确反省意识,体现了其人道主义精神(曹炜蓉,2014:2)。徐炜英在其博士论文《后殖民视阈下的远藤周作早期文学研究》中,简单提到了《夹着双拐的人》的主题是战后的日本、二战中国战场问题(徐炜英,2023:5),在论文论述中却有意识地忽略了,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述。

综上所述,过往的学术研究主要从战争反省的视角,对文本展开多方面的探讨与分析。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领导层及国家的批判。尽管已有研究提及日本军国主义对民众的规训,但鲜有人关注作者在文本中对个人战争责任的思考。同时,文本中涉及的战争创伤及其救赎主题,也罕有学者进行深入探究。以主人公加藤昌吉为代表的日本人为何无法获得救赎,其原因尚未得到充分的阐释。以战争创伤理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文本中呈现的战争创伤与救赎主题,探究复员兵加藤昌吉战后难以摆脱战争创伤的深层缘由,并进一步考察当时日本社会难以摆脱战争创伤的根源,有助于加深对远藤周作个人战争责任的理解。

1 战争创伤的异化

战争记忆的苦涩与创伤的难以摆脱,在远藤周作的文学世界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张力。作家将记忆主体聚焦于普通复员士兵这一特殊群体,通过身体书写的方式,揭示了战争创伤的集体性和普遍性特征。战争创伤在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中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特征:既是个人化的痛苦体验,又具有集体性的历史维度。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写历史,写创伤》中说:“创伤是一种经验的断裂或停顿,这种断裂或停顿使经验破碎,就有滞后效应。书写创伤就是书写事后影响,我把它称为创伤写作或者创伤后写作,或者从普遍意义上说,书写创伤是一种能指活动。它意味着要复活创伤经验,探寻创伤机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要分析并喊出过去,研制出与创伤经验、有限事件及其不同组合中,以不同方式显示的象征性效应相一致的过程。”(La Capra, 2001: 186)在《架着双拐的人》中,加藤内心的创伤发生了异化,影响了他的身体,导致他无法站立,只能依靠双拐行走。这正是心理创伤转化为身体创伤的典型例证。远藤周作将战争的

创伤投射于平凡的学校办事员加藤昌吉,细腻地刻画了战争对加藤昌吉的深远影响,塑造了其独特的战争创伤体验。加藤昌吉两年前便在东京一所中学担任办事员,然而,他始终未能摆脱战争带来的心理阴影。半年前,他开始感到下肢麻痹无力,最终双腿僵直,无法站立,只能依靠双拐行走。精神科医生菅通过一系列精神分析,揭示了加藤昌吉双腿瘫痪的深层原因:他在侵华战争期间,曾于中国华中某小村庄用刺刀杀害了一名青年,而当时那位青年母亲充满憎恨的眼神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心理负担。

身份认同是一个文化概念,“主要是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陶家俊,2004:465)。个体的伦理身份是对民族国家身份的重要感知方式,同时国家身份也反映在个人自我身份建构之中(黄晖等,2023:47)。战后,日本复员兵在身份选择时面临着种种困难,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身份认同出现危机,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时,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创伤。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直接给复员兵造成了严重的战争创伤,导致加藤成了一个架着双拐的人。加藤昌吉架着双拐的形象是广大复员兵群体的集体象征,大量的复员兵都处在身份认同危机之中,无法走出战争的阴影。

除了加藤昌吉之外,文本中另一位饱受战争创伤的人物是神经科医生菅。菅医生同样参与过战争,并长期在痛苦与罪恶感中挣扎,这使他内心深处产生了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他感到自己孤军奋战毫无意义,这种无力感始终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远藤周作,2000:17)。显而易见,菅医生对战争罪恶有着深刻的认识,意识到自己在战争中的责任,而其他入却缺乏这种意识。这种状况也正是菅所处的日本社会的真实写照。战败后的日本,普通民众普遍缺乏战争责任意识,没有认真反思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因战败而产生的对天皇的忏悔情绪。这种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几乎成为战后初期日本民众的普遍心态,与东久迩宫稔彦于8月17日组建战后首届皇族内阁时正式提出的“一亿人总忏悔”口号形成了呼应。

创伤经历往往被意识所压抑,潜伏于潜意识的表层,持续干扰着受创者的生活。它迫使受创者反复出现某些反常行为,导致现实人际关系破裂,并促使他们摆脱对家庭或其他社会共同体的依赖,从而打破既定社会关系中形成的自我认知。要想真正走出创伤,受创者必须将创伤记忆从潜意识层面提升至意识层面,将内在记忆转化为外在现实。

加藤对年长女性总是本能地怀有戒备心,却不明缘由。此外,他常常陷入发呆的状态,这表明战争创伤已严重影响了加藤的日常生活。而医生菅则深受战争创伤的影响,内心始终充斥着罪恶感和宿命论。在他的意识深处,学生游行等活动被视为徒劳无益之举。战争时期的经历如同噩梦一般,时常萦绕在菅的心头。

无论是加藤还是菅,作为战争的参与者,他们都因战争创伤而使正常生活受到了不同

程度的扰乱或干扰。远藤周作通过“架着双拐”这一核心意象,将个人创伤与集体记忆有机融合。主人公那句“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写照”(远藤周作,2000:184)的感叹,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概括,更是对战后日本世代的整体诊断。小说揭示的深层问题是:当整个民族都“靠在墙上”无法前行时,任何个体的救赎都注定是徒劳的。这种文学呈现既符合创伤理论关于“经验破碎”的论述,又超越了单纯的心理分析,达到了对历史责任的深层伦理拷问。

2 战争创伤的无法救赎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日本国民自身陷入了难以愈合的创伤漩涡。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核心课题之一,就是如何治愈这场战争留下的心理与身体创伤。随着《波茨坦宣言》的接受和文化管制的解除,日本文坛涌现出一批以战争创伤为主题的作家,其中远藤周作在其代表作《架着双拐的人》中,通过医生营与患者加藤昌吉的治疗关系,深刻探讨了战争创伤的救赎可能。

创伤研究理论指出,心理层面的解脱是创伤愈合的关键环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提出的“创伤发声”理论和朱迪斯·赫曼强调的“关系创建”理论(丁跃斌等,2014:129),都揭示了创伤叙述在治疗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当创伤记忆被压抑在潜意识中时,受害者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将其转化为可被处理的显性记忆,这一转化过程构成了创伤疗愈的基础机制。

在小说中,医生营采用系统的心理治疗方法对加藤昌吉进行治疗。治疗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首先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追溯童年经历,继而美国心理学方法,让加藤根据给出的人脸和风景图画进行联想,最终揭示出加藤双腿麻痹的深层原因——他在中国战场杀害青年后,始终无法摆脱受害者母亲充满仇恨的眼神。这一诊断过程完美诠释了创伤理论中“将潜在记忆转化为现实诉说”的治疗路径。然而,当治疗进入关键阶段时,传统心理治疗方法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营医生尝试了三种典型的解脱策略:战争责任转移(那是命令)、集体罪恶稀释(不只你一个人)和时间消解论(忘掉它吧),但这些说辞不仅无法说服加藤,就连医生自己也难以认同。这种治疗困境折射出战争创伤的特殊性:当个体暴力被制度性地组织化后,常规的心理治疗范式往往难以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营医生与加藤之间形成了特殊的“创伤共同体”。作为同样经历过战争的军医,营试图通过治愈加藤来实现自我救赎,这种治疗者又是被治疗者的双重身份映射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普遍处境。小说细致描写了营医生的治疗过程如何从专业诊疗逐渐演变为两个创伤个体的精神对话,这种关系的转变暗示着战争创伤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医学范畴,成为需要社会共同面对的精神课题。

加藤昌吉架着双拐的形象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这个意象不仅代表了个体的伤残,更象征着整个日本民族在战后的精神困境。远藤周作通过这个意象揭示了战争创伤的集体性特征:当国家机器将暴力合法化后,每个参与者都成了施害者与受害者的矛盾统一体。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双拐”意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战后日本社会在道德与生存之间的艰难平衡。

小说的结尾处,菅医生的独白“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形象”(远藤周作,2000:24)将个人叙事升华为集体叙事。这种将个体创伤经验普遍化的写作策略,使作品超越了单纯的战争控诉,进而探讨了人类普遍的道德困境。医生“不愿放弃”的坚持,既体现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也暗示着创伤救赎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通过分析《架着双拐的人》中的创伤叙事,我们可以发现远藤周作对战争创伤本质的深刻洞察:首先,战争创伤具有延宕性特征,其影响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其次,制度性暴力造成的创伤具有特殊的道德困境,传统的救赎方式往往失效;最后,创伤的彻底治愈需要建立超越个体层面的社会对话机制。这些认识对于理解战后日本文学中的战争叙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代创伤理论视野下重读这部作品,我们更能体会其前瞻性价值。远藤周作通过文学想象预见后来创伤研究证实的重要观点:创伤记忆的传递性、集体创伤的社会建构性,以及叙述行为在创伤整合中的关键作用。这使得《架着双拐的人》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更成为研究战争创伤的珍贵文本。

3 战争创伤无法救赎之因

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钊,2012:4),这一方法论要求我们必须在战后日本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解读《架着双拐的人》中加藤昌吉的创伤困境。通过还原1945—1950年的日本社会伦理环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加藤无法获得救赎的深层社会根源。

小说中医生菅的治疗失败绝非偶然,而是战后日本社会伦理困境的艺术再现。当菅试图用“那是命令,不是你的罪恶,而是战争的罪恶”来开导加藤时,这种说辞恰恰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推卸个体责任的普遍心态。这种集体无意识的伦理逃避,在文本中具象化为医生苍白无力的劝慰话语。

首先,日本战败后的特殊处理方式直接影响了小说人物的心理建构。美国占领军保留天皇制的政治决策,在文本中投射为加藤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混乱。正如小说描写的,加藤既无法摆脱杀害中国青年的罪恶感,又找不到应该为此负责的主体——这种精神分裂般的痛苦状态,正是“天皇免责”政策造成的伦理真空在个体心理上的具体呈现。值得注意的是,远藤周作特意设置“架着双拐”这一意象具有深刻的伦理隐喻。加藤不仅身体上依赖

双拐行走,精神上也始终无法独自承担战争罪责——这形象地展现了在“一亿总忏悔”的舆论氛围下,日本民众既无法真正忏悔,又不能完全解脱的伦理困境。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眼神”意象(中国母亲憎恨的眼神、加藤恐惧的眼神、医生困惑的眼神),构成了一个相互凝视的伦理场域,暴露出战后日本社会无法正视历史的目光焦虑。

其次,战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亿总忏悔”政策,在小说中转化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的责任博弈。加藤的创伤本质上源于“集体犯罪与个体承担”的伦理悖论:当整个国家机器都在逃避具体罪责时,个体士兵却要独自承受道德谴责。这种荒诞性在文本中表现为——加藤清楚地记得每一个犯罪细节(“青年母亲充满憎恨的眼神”),却找不到应该为此负责的伦理主体。小说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菅医生自己也是战争亲历者。这个人物设置暗示: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会环境中,即便是作为治疗者的知识分子,也无力构建真正的救赎话语。当菅说“今天,我又没能治好加藤,也没能够治愈自己”时,这句话道出了整个战后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伦理困境。

最后,加藤的身份认同危机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军国主义时期“为国而战”的伦理教导与战后“侵略战争”的道德定性之间形成的巨大落差,在文本中表现为加藤既不能否认自己的战争经历,又无法为之辩护的精神分裂状态。这种“伦理错位”造成的创伤,远非个人心理治疗所能解决。

远藤周作通过这个无法治愈的创伤故事,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关于战后日本社会的伦理寓言。加藤永远架着的双拐,象征着日本民族始终未能真正面对的历史负担;而医生菅的治疗失败,则预示着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会语境下,任何形式的救赎都是空中楼阁。这种文学呈现超越了单纯的战争描写,达到了对民族伦理危机的深刻反思——只有当整个社会建立起正确的战争责任认知,个体的创伤才可能真正愈合。这正是《架着双拐的人》作为战争文学杰作的独特伦理价值所在。

4 战争责任的反思

战后日本社会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战争责任。尽管当时许多作家都在探讨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军国主义政府,仅有少数作品涉及天皇的战争责任,而对普通士兵及民众的战争责任则鲜有提及。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与战后日本政府推行的“一亿人总忏悔”政策密不可分。该政策将天皇塑造为“宽宏大量的和平使者”,却要求全体国民为“未能赢得圣战”向天皇谢罪(王希亮,2003:194)。这种集体担责的论调不仅模糊了战争的侵略性质,更导致战争责任问题被有意淡化。事实上,这种政策导向使得日本社会在战后初期就形成了一种扭曲的责任认知体系——将战争责任抽象化为全体国民的共同过失,而非具体到个人和制度层面的真实问责。这种“集体忏悔”的实质是“通

过稀释责任来消解责任”，最终导致无人真正需要为战争暴行负责的荒谬局面，最终“没有人想要负责任，也没有人自己要求负责任”（约翰·W.道尔，2008：479）。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下，战后日本文学呈现出明显的“受害者叙事”特征。作家们多聚焦于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的创伤，如原子弹爆炸、东京大空袭等题材，却忽视了作为加害者的责任。这种叙事倾向与德国战后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更早开始系统反思普通人的加害责任。远藤周作的《架着双拐的人》则突破了这一局限，通过复员兵加藤昌吉的形象，深刻探讨了普通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加藤反复强调“是我干的，可那是命令”“我不愿意，可那是命令”（远藤周作，2000：23）的辩解，生动展现了战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责任推诿心态。这种“命令服从论”的心理机制，实际上延续了战时“绝对服从”的军国主义思维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医生营设计的各种开脱说辞——“那不是你的罪恶”“大家都干过”等——最终连他自己都无法说服，这一情节设置极具批判性地揭示了集体免责论的荒谬性。通过这种戏剧性的反讽，远藤周作实际上解构了当时日本社会盛行的“我们都是受害者”的集体叙事。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知识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深入讨论，远藤周作在创作上也呈现出新的思考维度。他在谈及《海与毒药》时指出：“是以日本人没有罪恶意识为切入点……在《海与毒药》之后自己心理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史军，2008：99）这种思考的深化在《架着双拐的人》中表现为对日本国民个人战争责任的严肃探讨。小说通过加藤无法治愈的心理创伤，以及那双象征精神瘫痪的拐杖，深刻揭示了在缺乏真诚忏悔的社会环境中，个体救赎的不可能性。这种身体残疾与精神瘫痪的对应关系，构成了远藤文学中独特的隐喻系统。正如评论家佐藤泰正所言，远藤周作在此展现的是“没有忏悔的创伤只会导致更深的异化”（佐藤泰正，1995：72）这一存在主义命题。加藤最终无法摆脱的心理阴影，恰恰印证了一个人若不直面自身罪责，就永远无法获得真正的精神解放。

虽然小说中提及中国受害者的“憎恨眼神”，但远藤周作的叙事重心始终放在加害者的心理创伤上。这种叙事策略并非忽视受害者的苦难，而是通过加害者的精神困境，更深刻地反思战争责任的伦理问题。正如远藤周作所言，他关注的是“日本人没有罪恶意识”这一深层文化心理。在《架着双拐的人》中，这种思考进一步发展为对国民个人战争责任的严肃拷问，体现了作家对战后日本社会集体回避战争责任现象的深刻批判。值得注意的是，远藤的这种创作立场与同时期欧洲思想家如雅斯贝尔斯关于“德国罪责问题”的论述形成跨时空呼应。雅斯贝尔斯曾区分四种罪责（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学罪责），而远藤通过文学形象探讨的正是后三种更为复杂的责任形态。这种比较视角显示，远藤周作的战争责任思考实际上达到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深度。

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看，《架着双拐的人》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突破了战后日本文学的

某些局限。当大多数作家还在原爆文学或转向文学中徘徊时,远藤周作已经将笔触伸向更为艰难的领域——普通人的加害者责任。这种创作勇气使他的作品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我们不仅能感受到文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更能体会到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在集体失语时代发出的清醒声音。这种文学勇气和道德担当,正是战后日本文学中最珍贵的遗产。

5 结语

《架着双拐的人》通过加藤昌吉无法治愈的战争创伤,不仅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集体记忆的伦理困境,更构建了一个关于战争责任的文化隐喻。远藤周作以文学的方式告诉我们:当历史创伤被简化为生理症状,当战争责任被消解为集体忏悔,最终沦为任何人都没有责任之时,真正的救赎就永远无法实现。加藤无法摆脱架着双拐的形象,正是战后日本民族精神困境的绝妙象征——既无法直面历史罪责,又难以获得心灵解脱。

本研究为理解战后日本文学中的战争叙事提供了新的阐释视角,揭示了“受害者叙事”背后的责任规避机制。同时,本研究通过创伤理论与文学伦理学的交叉运用,为战争文学研究开辟了方法论新路径,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东亚语境下,这项研究促使我们思考:如何超越狭义民族主义的框架,建立基于历史真相的和解伦理。远藤周作笔下那个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故事,对今天仍然面临历史遗留问题的东亚各国,都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继续深入:其一,将远藤周作的战争文学置于更广阔的东亚战后文学谱系中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不同国家/地区文学如日本本土与韩国乃至冲绳对战争创伤的表述差异;其二,结合新兴的记忆研究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何参与塑造集体记忆;其三,探讨远藤文学中的宗教维度与其战争责任思考的内在关联。这些研究方向不仅能够丰富对远藤周作文学的理解,也将为构建东亚共同的历史认知提供宝贵的文学参照。

正如医生菅在小说结尾的独白所示:“今天我又没能把加藤治好。也没能够把我自己治好。可是我还是不死心。”(远藤周作,2000:24)这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我们对待历史创伤的态度注脚——既不回避痛苦的过去,也不放弃和解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远藤周作文学,在向我们诉说关于战争记忆、战争责任与战后救赎的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 La Capra, Dominick. 2001.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曹炜荣. 2014. 战后日本文学中的反省意识——从《摇摆队长》与《架着双拐的人》来看[D]. 南京:南京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丁跃斌, 宿久高. 2004. 冲绳的异化创伤与文学书写——解读又吉荣喜《猪的报应》[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126-131.

- 黄晖,周丽秋. 2023. 失落的帝国将如何自处? ——《英格兰,英格兰》中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身份重构[J]. 外国语文(5): 46-54.
- 聂珍钊. 2012. 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史军. 2008. 远藤周作对基督教的日本式解读——以《海与毒药》和《沉默》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98-102.
- 陶家俊. 2004. 身份认同导论[J]. 外国文学(4):37-44.
- 约翰·W. 道尔. 2008. 拥抱战败[M]. 胡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479.
- 远藤周作. 2000. 架着双拐的人[J]. 文洁若,译. 小说界(5):8-24.
- 王希亮. 2003. “一亿总忏悔”与“天皇退位论”[J]. 抗日战争研究(1):192-207.
- 徐炜英. 2023. 后殖民视阈下的远藤周作早期文学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 佐藤泰正. 1995. 遠藤周作論——その文学と思想[M]. 東京:講談社.
- 赵雪莲. 2008. 那一辈人的形象——解析日本小说《架着双拐的人》[J]. 安徽文学(12):171-172.

Trauma and Salvation: A Reflection on War Responsibility in *The Man on Crutches*

SUN Yanyong

Abstract: “The Man with the Crutches” (Tsue to Tatakau Mono) is a war-reflection novel by Endō Shūsaku, centered on the themes of war trauma and redemption. Research on “The Man with the Crutches” has primarily focused on condemning the militarist leadership and the state that initiated the war. However, few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flection on individual’s war responsibility concealed beneath trauma and redemption. The work positions its protagonist as a microcosm of postwar Japan. B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alienation of the traumatized and demobilized soldier Katō and his ultimate inability to attain redemption, the novel metaphorically reveals the ethical predicament of postwar Japanese society’s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 context of postwar Japan where the public widely blamed militarism for the war and downplayed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this work reflects on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ordinary soldiers, and even ordinary citizens, should bear during the war. “The Man with the Crutches” not only broadens the scope of war responsibility inquiry within “Endō Literature”, but also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narrative pattern of postwar Japanese writers who depicted the Japanese populace solely as victims. It thus demonstrates a more profound consciousness of war reflection.

Key words: trauma; salvation; identity;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war responsibility

责任编辑:冯革

“中国故事国际传播研究”专题导言

在中国故事的域外传播中,文化主客体间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构筑起跨文化、跨文明交流的重要纽带,不仅推动中华文化自身的创新发展,更在双向互动中积极重塑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成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当承载着中华文化的饮食风物、古典叙事、诗坛气象走进异域语境,中国故事便不再是单一形式的文化叙事,其意义在翻译转化、文学重构与文化传播中持续生成,并由此展开世界范围内的多向度对话。本专题以“中国故事国际传播”为主题,通过三篇兼具学理深度与现实观照的论文,聚焦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多样形态与深层逻辑,揭示中国故事对外翻译与传播的多元途径。

中国饮食文化是中国故事中鲜活的“风味”载体,风味的跨语际传递往往伴随地域文化形象的再建构。邵璐和万海艳的《饮食翻译与地域文化形象重塑——以〈钟鼓楼〉英译为例》一文,融合翻译学与形象学视角,分析文学翻译中饮食细节的调整与转化,探讨文学翻译如何传递饮食语言背后的地域特质与文化内涵,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中地域文化形象的重塑过程与传播样态。文学经典是承载中国故事的重要文本形式,其在异域的改编与诠释,彰显着文化对话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可能性。肖娴的《从“中国故事”到英国文学——〈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西传》聚焦明代经典小说的跨文化流转与域外吸收,剖析中国“知音”故事在译介与改写过程中如何突破文化与文类壁垒,融入英国文学创作语境,成为中外文学交流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展现中国故事的跨文化适配力与文学感染力。诗歌是中国故事里的诗意声音,也是回响民族心灵的语言密码,朦胧诗派的译介传播是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葛文峰的《香港〈译丛〉与朦胧诗派的对外译介传播》一文,以兼具地域优势与国际视野的文学译介期刊《译丛》(*Renditions*)及单行译本丛书为切入点,探索该期刊在朦胧诗派对外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实践路径,探讨其如何搭建起朦胧诗派与世界文坛对话的平台,助力中国当代诗歌独特风貌与美学内核的国际传播。

从饮食风味到文学经典,从传统叙事到当代诗坛,本专题所刊载的三篇论文,既关注具体文化载体的翻译传播实践,也深入挖掘其海外传播逻辑与价值内核。期待通过这些探讨,为新时代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参考,并为面向海外受众的文学译介与传播实践提供经验参照。

中山大学 邵璐